

职业教育：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的内生性源动力

——基于积极福利改革视角的分析

郭海龙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北京 100017)

摘要：来源于“第三条道路”的积极福利改革，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在世纪之交针对欧洲第一代福利国家弊端进行系统性改革举措的总称，提供了一个在民生领域精准施策的治理框架。其核心内容是：对老弱病残进行“兜底”的同时，对有劳动能力的人，收紧福利发放条件，把民生资金用于社会再投资，使之与促进就业、职业技能培训、从事公益事业挂钩，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路对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脱贫攻坚时期，精准扶贫与积极福利改革的思路不谋而合；在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质是农村现代化，关键是农民现代化。职业技能培训则是农民现代化的基础环节。为对有劳动能力者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应提高重视程度、转变观念摒弃偏见、加大培训力度、激发其通过学习职业技能发家致富的积极性。从而以职业技能培训为基础、以职业教育带动产业振兴为龙头，多管齐下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性源动力。

关键词：积极福利；乡村振兴；农民现代化；职业技能培训；内生性源动力

0 引言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优秀传统文化，早在上古时代就开始了对“小康”和“大同”的追求。中国共产党自从诞生以来，就以国家独立、人民幸福为己任，以为民造福作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减贫事业不断取得进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做出一系列新决策新部署，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对全球减贫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 7.7 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标准，

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 70% 以上。我国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①减贫目标，赢得了包括带有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在内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时至今日，我国脱贫攻坚事业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为了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促进乡村振兴，还需要在文化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具体来说，需要不断提升农民整体素养，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就业需求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水平，从而在内在层面通过农民的现代化，带动并实现乡村现代化，在实质层面推动乡村振兴，为乡村振兴提供内生性源动力。

1 积极福利改革：一个在民生领域精准施策的治理框架

世纪之交的积极福利改革，是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针对欧洲第一代福利国家弊端进行系统性

作者简介：郭海龙，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邮政编码：100017，电子信箱：ghl46258@163.com。

^①《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 2015 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次会议上通过，2016 年 1 月 1 日正式启动的议程。新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为今后 15 年实现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努力。这些目标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需求并强调不会落下任何一个人。新议程范围广泛且雄心勃勃，涉及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层面：社会、经济和环境，以及与和平、正义和高效机构相关的重要方面。该议程还确认调动执行手段，包括财政资源、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以及伙伴关系的作用至关重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这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是人类的共同愿景，也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与各国人民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它们既是一份造福人类和地球的行动清单，也是谋求取得成功的一幅蓝图。”

改革举措的总称。第一代福利国家诞生于二战后初期的欧洲，以瑞典、英国最为典型。其中，瑞典的福利制度涵盖面广，被称作从摇篮到坟墓（from cradle to tomb）（秦富民，2010）。作为大国，英国的福利制度是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建设福利社会的一个典型代表，其国民医疗体系（NHS）（刘岩，2020）独具特色，至今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福利国家的出现，是对1929-1933年各国经济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的深刻教训加以吸取、反思的政策结果，也是欧洲国家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支持下，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稳定性而积极建构的结果。福利国家建设缓和了阶级矛盾，促进了欧洲经济在战后再次崛起，促成了资本主义从“西方的没落”（斯宾格勒的说法）、“垂死”（列宁的说法）到起死回生的转变，倡导福利国家建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被认为从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病榻边上“妙手回春”的医生。福利制度促进西方在与苏联的制度竞争中获得了相对比较优势，对苏联东欧国家民众产生了吸引力，诱导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比如，东德民众冒着生命危险翻阅柏林墙甚至绕道匈牙利、奥地利涌向西德，就是西方福利制度对东德民众产生强烈吸引力的典型表现，这一潮流最终冲垮了柏林墙。而欧洲二战后出现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就与福利国家建设密切相关，由于建设福利国家的欧洲国家主要位于莱茵河两岸，因此，福利国家建设模式被称作“莱茵模式”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属于高放所说的“社会资本主义”）。

但是，这一模式在1973年第三次中东战争诱发的石油危机面前，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由于在战争中，西方偏袒以色列，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利益，阿拉伯国家为主的欧佩克（OPEC）于是对欧美实施石油禁运，欧洲福利国家的莱茵模式陷入了“滞胀（stagflation）”危机，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

并存，欧洲经济竞争力严重下滑。在危机面前，高福利、高税收的莱茵模式难以为继，通过财政与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措施刺激经济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走到了尽头。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等人的货币供给学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以1979年英国撒切尔夫夫人和1980年里根上台为标志，英美率先开始了新自由主义“革命”。新自由主义认为，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极力削减福利等公共开支、大规模减税，激发了企业活力，摆脱了滞胀危机。由于英美两国都以盎格鲁-萨克逊人为主体，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也被称作“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但是，新自由主义降低了社会保障，重新拉大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导致社会矛盾尖锐，罢工潮不断，执政合法性出现挑战。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到了1990年代初期，放松管制、在福利等方面“管得最少”的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罢工潮不断等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积弊。例如，因赢得马岛海战而在国内外具有重大威望的撒切尔夫夫人，正是在这种罢工潮冲击下黯然下台的。

此时，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张耀军，2000）的“第三条道路”^②成为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选择，英国、德国是这方面变革的代表。“第三条道路”的民生政策就是积极福利改革，即改变过去那种新自由主义放松管制、盲目削减福利的倾向，也改变第一代福利国家“养懒汉”的倾向，找到一套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并且用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路线。

积极福利主要举措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对无劳动能力的人实行兜底，保障青少年、孕妇、老年人、残障人士的基本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在对老弱病残“兜底”的基础上，对有劳动能力的人，收紧福利发放条件，福利发放与促进就业、培养劳动技能、从事公益事业挂钩。

② “第三条道路”，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它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此后经常被社会民主党和欧洲社会主义者所使用，以显示自己的观点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像过度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主张这种路线的党派，被称为“新左派”。在历史上，曾有过不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最初就以不同于美、苏的“第三条道路”自居；在中国抗战胜利前后，民主人士所幻想走介于中共和国民党的中间路线，也被称为“第三条道路”。本文所用为特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家中左翼政党提出的一套理论与主张，其本质是社会民主主义的调整，并非独立的社会发展模式，但却是社会主义实践一种探索类型。

具体而言,对有劳动能力的人,领取失业金的额度与工作收入水平挂钩。而且,明确规定失业者在一定期限内必须就业、参加就业培训或者参加公益岗位工作,否则就削减失业金发放额度,直至停发。为了推动积极福利改革,英国、德国、荷兰及北欧国家普遍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开展就业指导和帮扶,提供公益劳动和灵活就业岗位,从而以积极手段促进就业、降低失业率。通过福利发放条件与促进就业挂钩,既调动了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又促进了就业和经济发展。比如,英国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就业服务中心和网站设施,督促失业者参加培训或就业;德国通过哈茨 I-IV 方案,大幅度削减了失业救济金发放额度,明确不就业就逐步削减失业救济金,直至完全取消。

积极福利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英国、德国、荷兰及北欧国家由于兼顾了公平与效率,既避免了新自由主义条件下贫富分化造成的社会动荡,又避免了第一代福利国家“养懒汉”导致的沉重债务负担(刘慧,2022),使得经济发展在世纪之交展现出活力,并且经受住了 2008 年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考验(郭海龙,2019),与当时的“欧猪五国”^③和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在 2008 年经济危机诱发的欧债危机面前,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北方国家,由于积极福利改革节约了开支、扩大了税源,自身财政状况良好,成为欧洲纾困方案和稳定机制(ESM)的重要支柱,并主导制定了欧洲统一的财政纪律。与此同时,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等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虽然在政党轮替中下台,但是其“第三条道路”积极福利改革成果,被继任者卡梅伦、默克尔等政治家继承,形成了新的政治共识。值得一提的是,在世纪之交,德国社会民主党政府总理施罗德为了推行积极福利改革,不惜得罪党内左派,甚至造成了以拉封丹为代表的党内左派出走,

削弱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而丢掉了总理宝座。这种以政治前途为赌注的改革魄力,赢得了政敌基民盟主席、接替总理者默克尔的赞许和尊重,默克尔上台后,一再表示要继续推行施罗德的积极福利改革,被称作“没有施罗德的施罗德主义”。无独有偶,英国保守党在击败工党赢得大选后,担任英国首相的保守党领袖卡梅伦延续了布莱尔和布朗政府的积极福利改革,比如征收富人税,鼓励大学毕业生参加就业培训并积极参加工作等,这些举措与布莱尔当政时期差别不大,被称作“布莱梅伦主义”,标志着欧洲朝野在积极福利改革方面达成了新的共识。积极福利改革所体现的精准施策理念,值得全世界各国在福利(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借鉴学习。

积极福利改革是一个在民生领域精准施策的治理框架,为我国的精准脱贫和在乡村振兴中精准帮扶提供了某些有价值的重要参考。

2 后扶贫时代我国的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与历史使命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长期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脱贫攻坚战线的不懈努力,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已经解决,我国由此迎来了“后扶贫时代(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张咏梅等,2022),所面临的问题已经发生变化,相应的政策措施也随之革新。后扶贫时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一个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脱贫人口重新返贫,并在此基础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此,不仅应关注物质扶贫,更应关注文化扶贫,为维持可持续生计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具体来说,需提供必要的职业教育,为相关摘帽户培训出拥有获得稳定收入的职业技能。

这方面,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在积极倡导,有关政策已经出台,在国家治理层面为通过职业技能

^③ 欧猪五国,这是国际经济媒体对欧洲 5 个较弱经济体的贬称,特别指各国的主权债券市场,这些国家的公共赤字也都超过了 3%。2010 年初,欧洲有很多人对经济不景气、出现债务危机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西班牙(Spain),这五个欧洲国家因其英文国名首字母组合“PIIGS”类似英文单词“pigs”(猪),故因此得名。该名词最早由专栏作家朱莉安·冯·里珀特-俾斯麦(Juliane Von Reppert-Bismarck)于 2008 年 7 月 7 日发行的《新闻周刊》杂志上文章《为什么猪不能飞》(Why Pigs Can't Fly)使用,用于指代处于金融困境的上述几个国家。欧猪五国当时的 GDP 占欧元区 GDP 的 13.2%(2013 年数据)。与此同时,匈牙利政府也语出惊人的表示,自身财政与希腊一样面临重大危机而引发全球股市恐慌,不过财经专家表示,说匈牙利像希腊一样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有些过分夸张,除了因匈牙利尚未加入欧元区外,匈牙利本身的财政状况其实好过笨猪五国。不过为了避免危机发生,国际货币组织已前往匈牙利进行调查。除了上述的国家外,经济学家也开始点出法国、比利时、奥地利这三个西欧国家其财政可能将步笨猪国家的后尘。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及波兰的财政情况也一样并不乐观。

培训促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宏观政策支持。

2021年2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强调，要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对脱贫地区产业要长期培育和支持，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责任，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这实际上指明了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底线是为了巩固脱贫成果，保证脱贫摘帽户不反弹。同一天，按照安排，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包括10章，共74条，规定：每年农历秋分日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建立乡村振兴考核评价制度、工作年度报告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实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建立健全有利于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健全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制度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农村住房建设质量安全管理；分类有序推进村庄建设，严格规范村庄撤并，严禁违背农民意愿、违反法定程序撤并村庄。

2021年11月22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等部门联合印发《“十四五”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④，计划有重点地推动革命老区为代表的局部率先实现乡村振兴，意在通过革命老区的再次燃起的“星星之火”，呈现出“可以燎原”之势，以点带面推动全国范围内的乡村振兴。

上述讲话和政策、法规将大大促进乡村振兴，而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乡村实现现代化（毛小报等，2022）的过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号角已经吹响。而乡村振兴隶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是通过全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弥补乡村这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短板”，

确保乡村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大踏步赶上时代步伐。而现代化的关键，是人的现代化（阿历克斯·英格尔斯，1985）。同理，以乡村振兴为实质的农村现代化，关键是农民的现代化。这就需要从各方面提升农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二者的最佳结合点就是职业技能水平。职业技能是一个人职业素养的根本体现，是安身立命之本，是维持生计的谋生手段，是精神层面的技能在物质层面的实践表征。

目前，实施乡村振兴保底任务是巩固脱贫成果。而当前，刚脱贫地区在文化领域还存在一些不足，比如，文化普及的内容存在一刀切现象，与乡村振兴所需要的职业技能、产业发展需求不够匹配，缺乏针对性。具体来说，脱贫摘帽户持续维持生计的能力不足，返贫的压力较大。背后原因错综复杂，除了自然条件限制、生理因素（老弱病残）致贫返贫外，普遍的基础因素是：对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投入不够（张媛媛，2022），脱贫户职业技能培训尤其缺乏，无法培育可持续生计和经济发展的产业生长点。这是当前乡村振兴需要重点关注之处，也是关系到长远发展的薄弱环节。

从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来看，职业技能教育是落后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原子武器”（王润贤，2011）。德国早在普鲁士时代，就已经注重对国民从小就抓素质教育，培养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二战后，德国和日本从一片废墟瓦砾的战败国，快速崛起为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背后的关键因素就是大力发展职业技能教育，并且对职业教育不存在歧视。如今，德国普遍存在的综合院校（Hochschule），是职业教育的代表。

与德国、日本等国把职业教育当“原子武器”相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国在职业教育方面，瓶颈比较明显。存在着受歧视比较严重、出路不广、社会观念陈旧和转变不彻底等消极因素。在青少年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上职业学院意味着低人一等的错误观念。而初中毕业时的“分流”则强化了这

^④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等15个部委，印发了《“十四五”支持革命老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支持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的具体行动，《方案》从健全帮扶长效机制、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特色产业、完善政策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十六条创新性政策，对于支持12个革命老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走出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具有重要意义。

种观念。这一状况引起了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了促进产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职业技能教育正在不断加强。2022年5月1日起实行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⑤,不再在初中毕业时,强行对学生进行“分流”,首次允许职业中专学生参加高考,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习成果互认、互相接轨、互相转化。可以说,新职业教育法是职业教育摆脱歧视,打通国民教育与职业培训,向发达国家标准看齐的一个重大利好。这意味着,我国的职业教育发展将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现代化。这是时代的进步,必将有助于缓解本科生“就业难”和高级技工“用工荒”同时并存的问题。

3 方兴未艾的职业技能培训:乡村振兴的内生性源动力

从世纪之交欧洲积极福利改革这一民生治理框架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本科生“就业难”和高级技工“用工荒”同时并存的问题,还要从把职业培训培养成经济发展的增长点做起,对于科技、人文、教育都比较匮乏的乡村而言,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资于职业技能培训,无疑是国贫攻坚过程中为当地人“造血”的根本出路,是乡村振兴的最佳切入点,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内生性源动力。

积极发挥社会保障推动经济发展的功能,是西方国家克服第一代福利国家“养懒汉”弊端、避免新自由主义缺陷,开展积极福利改革的重要内容。积极福利的民生治理框架,与我国之前的精准扶贫(李志伟,2022)以及未来的精准扶持乡村振兴,有着异曲同工之效。应通过发放社会保障资金与促进职业技能培训挂钩,除了对没有劳动能力的摘帽户实施兜底政策外,更需要聚焦于提升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程度、转变全社会的思想观念,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即谋生能力)实现可持续生计,维护广大相对地区摘帽民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激发发家致富的源动力。

3.1 各级党委政府应提高认识,重视职业技能培训对劳动者就业的促进作用,以积极手段促进就业,

抓好就业这个民生之本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集中统一领导制度下,各级党委政府是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经济规划、产业布局、乡村振兴的难点和重点,都离不开党委政府的筹划。如前所述,职业教育是二战后德国、日本等国在战败的废墟中实现再次崛起的原子武器。对此,应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好好地利用这一秘密促进乡村振兴。正如此前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钟迎春,2021)一样,今后的乡村振兴,需要把摘帽地区下一代的职业教育工作做好,特别是应注重山区摘帽地区下一代的成长。在义务教育应搞好的基础上,应大力兴建职业技术学院,帮助摘帽地区群众提高文体素养、就业能力特别是生计能力,通过各种接地气的职业教育把摘帽地区孩子培养成身怀职业技能的熟练技术工人、高级技师乃至工程师,成长成才,满足社会缺口,推动农村地区各项产业的现代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通过多渠道培养就业能力改变脱贫户的命运。并以此为纽带,鼓励在外乡土人才反哺家乡、其他产业反哺农业,带动当地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只有这样,乡村振兴才能从根本上抓起,而以职业教育带动产业发展,才是乡村振兴的治本之策。

3.2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彻底转变人们的观念,以新职业教育法为标准,为职业教育“正名”,为职业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迎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从而加速促进乡村振兴

在中国上千年科举制度传统影响下,很多人在观念中存在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陈腐观念,轻视劳动、轻视技术。在日常教育中,重视诗词歌赋、人格修养,轻视手工实践、动手能力的现象比较普遍。这种观念十分迂腐,曾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也阻碍了我国历史上的科学研究,困扰着中国突破禁锢,导致了近代的落伍。这也是造成我国古代技术发达而科学滞后的“李约瑟之问”(孙冠臣,2020)的根本原因。目前,长期广泛存在的本科生甚至硕士生“就业难”(陈磊等,2022),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是为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养和技术技能水平,促进就业创业,建设教育强国、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宪法,制定的法律。2022年4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与社会上同时大量存在的“技工荒”(项万明,2021),形成了鲜明对比和强烈反差,预示着我们的教育制度轻职业技术培训、重学识教育,难以与社会发展需要充分匹配,所学非所需、所需非所学,导致教育资源极大浪费。而在疫情背景下,上述矛盾空前加剧,结果是,找不到工作的本科生考研、找不多工作的硕士生考博,虽然客观上提高了整体学历水平,但是,教育领域的严重“内卷”(龙煦霏,2021)也给高等教育和未来就业带来了空前的压力。北大女博士加入城管行列的新闻(颜维琦和薛梦娇,2013)一度成为热搜,就是这种扭曲现象的真实写照。这种扭曲现象的背后是上述错误、过时的观念在作祟。时至今日,国内外的现代化历程表明,职业教育是决定一个国家能否实现产业振兴和国家崛起,能否跳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⑥,能否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对新职业教育法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全社会彻底转变观念,放下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歧视,从头脑观念中重视起职业技能培训。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由于农村地区接触外界信息相对较少,是传统陈腐观念最后的渊藪,轻视职业教育的情况在农村更加明显,因此,尤其要注重对农民宣传到位,针对农村青少年高中就学率低等情况,应出台鼓励农村青少年参加职业教育的政策,在职业培训补贴、就业推荐、人才引进和创业孵化等方面加大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扶持力度,培训出现代化农民和高级产业工人等各行业的行家里手,使其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从而激起大家通过练就职业技能本领实现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3.3 加大职业培训力度,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应明确把引导就业、鼓励就业技能培训与发放保障金挂钩,从而通过推动就业带动产业发展

在积极福利的民生治理模式下,扶贫和乡村振

兴都不应“养懒汉”(黄腾和刘晶瑶,2021),在摘帽后,应对有劳动能力的群体实行引导就业与限制领取保障资金相结合的政策,使他们走向职业培训之路。一方面,积极引导、教育、培训,让摘帽群体通过畅通的渠道获得必要的职业技能,从而获得谋生能力,成为地区产业发展振兴的中坚力量甚至是产业领头人;另一方面,对于有“等、靠、要”思想的摘帽户,有劳动能力的,应收紧民生资金发放条件,限定救济发放周期,明确规定必须参加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参加志愿活动或者参加相关部门及社会组织推荐的公益岗位,才能获得继续领取社会保障资金的资格。此外,还应结合群体特点,大量提供公益岗位,加大职业介绍力度。用社会帮扶资金有效鼓励人们参加培训、促进就业、积极参加公益事业,从而带动经济产业和社会事业进步,通过经济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稳步夯实乡村振兴的内涵。这样,才能把农民当做乡村振兴的主体,不断对农民赋能,培养农民的乡村振兴能力,让他们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内生性源动力,用自己勤劳致富的巧手托举起更加美好的明天。

3.4 加大精准施策力度,在全社会树立“多劳多保、少劳少保”的积极观念,克服“等、靠、要”等懒人思维和路径依赖

对共同富裕不是养懒汉的具体措施,应宣扬清楚,避免摘帽人口产生“等、靠、要”观念。正如精准扶贫模式下扶贫要扶志(贺光华,2018)那样,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把当地致富能人请进职业教育课堂,激发和调动参加职业培训、避免返贫、发家致富的内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畅通摘帽人口接受职业培训的渠道,对培训进行政策鼓励和资金扶持,树立通过职业教育发家致富的典型,达到“做好一个、带动一片、造

⑥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中奉行GDP增长方式,经过一段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时,由于道德沦丧、法治崩溃、腐败与两极分化严重,迅速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并使既得利益集团迅速垄断国家资源、掌控国家经济命脉、掌握国家大部分财富,造成国内市场萎缩、产业升级乏力、增长停滞不前、民族主体性削弱、经济对外依赖性增强的状态。拉美地区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一些国家收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如菲律宾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684.6美元,2014年仍只有286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人均收入基本没有太大变化。还有一些国家收入水平虽然在提高,但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如马来西亚198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812美元,到2014年仅达到10804美元。阿根廷则在1964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1000美元,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上升到了8000多美元,但2002年又下降到2000多美元,而后再回升到2014年的12873美元。墨西哥1973年人均GDP已经达到了1000美元,在当时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而2014年人均GDP只有10718美元,41年后仍属于中等偏上国家。拉美地区还有许多类似的国家,虽然经过了二三十年的努力,几经反复,但一直没能跨过15000美元的发达国家的门槛。

福家乡、遍地开花”的良好效果，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通过职业技能素养的提升，给乡村振兴提供内生性源动力，为农村现代化插上健硕的双翼，从而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推动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战略目标。

4 结语

由于人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本质、乡村振兴的基础，因此，乡村振兴的关键点是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只有这样，才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性源动力。这就需提高认识、转变观念、加大力度、精准施策，多管齐下共同提升农民的综合素养，尤其是职业技能。从而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基础、以其带动的产业振兴为龙头，为乡村振兴奠定扎实的人文、技能和产业基础。

参考文献

- [1] [美]阿历克斯·英格尔斯, 1985《人的现代化》, 殷陆君译.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2] 陈磊、唐心恬、庞国伟、田原、汤凯璇、张奥, 2022《疫情影响下本科生就业观分析及对策探讨》,《现代商贸工业》第43期。
- [3] 贺光华, 2018《扶贫要扶志 补足精神上的“钙”》,《河北农业》第7期。
- [4] 郭海龙, 2019《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前后欧洲的积极福利改革及其启示》,《科学社会主义》第1期。
- [5] 黄腾、刘晶瑶, 2021《找准“懒汉难扶”的病根》,《新华每日电讯》2月3日第7版。
- [6] 李志伟, 2022《中国的精准扶贫是“非凡的故事”》,《人民日报》4月28日第3版。
- [7] 刘慧、李文见, 2022《欧洲福利国家危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政治经济学评论》第1期。
- [8] 刘岩, 2020《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与国家身份认同》,《文化研究》第2期。
- [9] 龙煦霏, 2021《研究生招生“内卷化”下选拔模式改革的“新标尺”》,《中国商界》第5期。
- [10] 毛小报、毛晓红、王瑾, 2022《乡村振兴背景下浙江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水平评价》,《安徽农业科学》第8期。
- [11] 秦富民, 2010《瑞典的民生:从摇篮到坟墓》,《决策与信息》第4期。
- [12] 孙冠臣, 2020《现代性视域中的“李约瑟问题”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第1期。
- [13] 王润贤, 2011《德国职教:“根”植于行业》,《教育与职业》第4期。
- [14] 项万明, 2021《缓解高级技工荒的对策研究及实践》,《现代职业教育》第29期。
- [15] 颜维琦、薛梦娇, 2013《硕博应聘城管说明了啥?》,《光明日报》5月21日第5版。
- [16] 张耀军, 2000《经济全球化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第4期。
- [17] 张咏梅、张萌、赵金凯, 2022《“后扶贫时代”中国多维相对贫困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统计与决策》第9期。
- [18] 张媛媛, 2022《以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中国社会科学报》4月22日第4版。
- [19] 钟迎春, 2021《精准扶贫视域下高职学生“扶贫必扶智”教育的模式和评价研究》,《科学咨询(科技·管理)》第7期。